

周奇◎编

传播视野与中国研究

《学术月刊》丛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奇◎编

传播视野与中国研究

《学术月刊》丛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播视野与中国研究/周奇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学术月刊》丛书)

ISBN 978-7-208-11529-3

I. ①传… II. ①周… III. ①中国—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4971 号

责任编辑 顾 雷

封面设计 甘晓培

· 《学术月刊》丛书 ·

传播视野与中国研究

周 奇 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30.75 插页 2 字数 546,000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1529-3/G · 1610

定价 68.00 元

前言

2012年,适逢《学术月刊》创刊55周年,举行了多场学术纪念活动,“传播视野下的中国研究”学术研讨会即是其中之一。

《学术月刊》以发展和繁荣学术为己任,一直重视理论创新与多学科交叉研究,关注基础理论与社会现实问题,鼓励学术争鸣。2012年7月举行以“传播”为主题的研讨会,正是希望鼓励学者采取跨学科的视角,本着开放和提高的精神,从资讯传播与大众容受的立场,以“阅读”、“传播”、“媒介”和“中国”等关键词为中心,共同探索和开拓中国研究的新取径、新方法,进而深化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认识,也为更好理解中国现实提供历史之镜和因应之道,并借此希望同当代世界前沿学术思潮进行对话。

从会议收到的来自世界各地三十多位与会学者的论文来看,关注的问题从历史到现实、从传媒到词语、从书写到形象等,涉及的领域有新闻学、广告学、文学、历史学、哲学、语言学、医学、人口学、法律史、史学理论等学科,文章各有侧重,但都注重从传播和跨学科的角度来研究,都在试图对老问题提供新视角的解读,或者挖掘新材料、运用新方法来纠正过去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或者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展现新的问题意识。而在两天的会议当中,与会者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当然,还有相互的批评与对既有研究情况的检讨。

从最后与会学者的反应和讨论效果看,本次以传播为主题的会议应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不但促进了跨学科的了解和交流,也激发和开拓了不少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论域。而一些善于讲故事的文章,尤其吸引了大家的注意里,像邬国义教授关于马可·波罗形象的文章、陈建华教授关于拿破仑形象的文章;顾峥教授引用图像资料,从传播的角度分析宋教仁遇刺照片的文章;等等。现在,这里把与会论文结集出版,既是对这次会议成果的公开展示,也是我们对这次“传播”会议的总结,希望未来能有机会再次召开这样的会议和出版类似的文集。

编者谨识

2013年12月

目 录

前言	1
----------	---

中西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方法

奈何问题,若何方法

——有关跨文化形象学研究的再反思	周 宁 / 3
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邬国义 / 14
黑格尔哲学在清末中国的译介与容受	张仲民 / 49
德国传媒视野下的晚清中国形象	王维江 / 81
拿破仑“三戴绿头巾”	
——民国初期都市传播文化的女权与民主倾向	陈建华 / 92
“主义”知多少?	陈力卫 / 115
近代西方国际法文本的阅读与本土化生产	
——试论朱克敬的《公法十一篇》	林学忠 / 140
从“外国冬至”到“圣诞节”:耶稣诞辰在近代中国的节日化	
——以《申报》为基础的考察	邵志择 / 156

中国传播媒介的建构与更新

耳目喉舌:旧知识与新交往

——基于戊戌变法前后报刊的考察	黄 旦 / 177
作为新闻照片与宣传照片的肖像照片	
——以《民立报》为例	顾 铮 / 208
近代报刊与士林格局	
——以戊戌湖南“新旧”分野为例	朱至刚 / 221

建构“文化权势”:成舍我在五四前后的社交圈与世界报系之建立	唐海江 / 235
中西医学话语与近代商业论述	
——以《申报》上的“痧药水”为例	皮国立 / 257
20 世纪 30 年代《人口副刊》与生育节制话语	俞莲实 / 288
农村改革以来中国媒体“涉农”新闻报道的变革与动因	王润泽 王 洁 / 308
网民政治性的批评表达过错责任问题	陈堂发 / 324
网络时代的微博问政	陈 潭 / 332

传播视野与大众文化

碑刻、印刷与明清公共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周启荣 / 343
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础常识建构	
——以转型时代的民众读本为中心(1895—1928)	瞿 骏 / 357
旧制与新规	
——中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电影检查制度研究	汪朝光 / 374
“文字起于声音”:近代汉字拼音化思想对一个传统训诂理论的继承式颠覆	王东杰 / 387
从“说话”到“说书”	
——从说唱伎艺名称的改变看明代通俗小说出版的影响	黄 卉 / 420
大众艺术及对中国流行电视剧中政治言论的理解 ···	佛洛里安·施耐德 / 428
“上海再造”	
——传播视野中的中国城市研究	孙 玮 / 441
上海开埠与中国出版格局的变化	章宏伟 / 453
在上海“制作”观众	
——民国时期的电影与“共同体”想象	孙 黎 / 463

中西跨文化传播 的问题与方法

奈何问题,若何方法

——有关跨文化形象学研究的再反思

周 宁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笔者在《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的“前言”中谈到,学术研究应该饱含理想,以专业的方式关注时代的重大问题。^①这其中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专业的方式”。所谓“专业的方式”,是指具有深厚学术史积淀、明确的概念体系、合理的分析方法的训练有素的研究,超出“专业的方式”或无法达到“专业的方式”,都不属于“学术研究”。二是“时代的重大问题”。所谓“时代的重大问题”,是学者自身从专业的角度发现并思考的、切入时代精神并决定社会历史走向的问题,并不是学术之外被指示或被确定的问题;所谓重大,也不仅是现实意义的重大,还有学理意义的重大,后者的意义在于发现问题、揭示真理、创造自由,改变人们的思想方式。

站在这个起点上,反思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要点在于问题与方法。就问题而言,跨文化形象学关注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以及其中的西方霸权,问题直接指向西方主导的现代性观念秩序中中国的话语主体命运。所谓中国形象,只是“他者”镜像,而所有关于“他者”镜像的研究,最终都落实到自我的主体性身份的建构。于是,在西方现代性话语主导的世界现代性观念体系中,所谓中国思想主体性状况如何,为何出现危机并如何重建中国现代性思想主体,就成为跨文化形象学的终极问题。跨文化形象学试图通过解构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的西方霸权来建构中国现代性思想主体,如果解构是成功的,建构却无从展开。我们反思的关键点就在于,中国思想的主体性危机究竟意味着什么,重建中国思想主体的问题理路是否清晰?甚至重建中国思想主体的提问是否合理?

跨文化形象学意识到的问题,是当下中国思想的核心问题,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必须经过中国思想的诠释,才能获得其历史的正当性;也是当下文化自觉的使命所在,文化自觉首先是中国思想与中国思想主体的自觉。思想的困境

① 周宁:《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可能出现在问题本身,也可能出现在方法上。就方法而言,中国思想如果脱离西方镜像,主体性自我建构似乎就无从完成;而在西方作为“他者”的镜像下,中国思想不论作为思想对象还是思想主体,又都无法获得意义与价值的自主性。这样,从西方主导的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拯救中国思想主体,就只能先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于是,以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为主的“后学”方法,就自然成为可供选择的批判工具。方法上的疑问是,相关的“后学”理论途径,是否可能通向中国思想主体的建构?在中国思想主体与西方文化霸权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内,是否能够赢得中国现代性主体身份?所谓中国现代性思想主体的问题,除了表达立场与宣誓诉求之外,能有多少真正的思想成果或贡献?

—

首先,跨文化形象学关注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构成与类型,《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①在跨文化形象学框架内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从跨文化形象学的角度提出问题,研究中国形象的构成与意义、形象的类型化特征与原型;在西方现代性的深度上分析问题,讨论中国形象的生成在西方现代文化中的功能。在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中讨论中国形象。首先是西方现代性精神形成时期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问题是从传统的、基督教伦理主导的“统一的文化价值”中挣扎分离出来的西方现代文化观念,诸如民族-国家与民主政治信念、世俗化物质主义与个人主义、科学与进步观念、理性主义哲学等,最初如何借助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隐喻地表现自身,完成西方现代性的自我建构。西方现代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从一个侧面证明,现代性思想形成于跨文化或文明之际的“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中,是一个多元发展、相互作用的进程,不仅西方现代性塑造了现代中国文化,中国形象也作为文化“他者”参与塑造西方现代文化的“自我”。中国形象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他者”镜像。它可以是理想化的,表现欲望与向往、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的乌托邦;也可能是丑恶化的,表现恐惧与排斥、满足自我确认与自我巩固需求的意识形态。启蒙运动高潮时期,西方现代性确立,中国形象也相应出现彻底的转型,从社会文化想象的乌托邦变成意识形态。中国成为停滞衰败的帝国、东方专制的帝国、野蛮或半野蛮的帝国,三种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类型出现。西方现代性自我观念的构成与身份认同,是在跨文化交流的动力结构中通过确立他者完成的。

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意义不仅在于说明其作为一种虚构或叙事,如何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中发挥功能的,这是后殖民主义文化

^① 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批判理论关注的问题,笔者更感兴趣的是从中国形象的建构过程与方式中理解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尤其是理解这种精神结构的动机与活力。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在揭露西方现代性文化观念中的霸权结构的同时,可能遮蔽西方现代性的开放与自我批判的机制,使后发现代化国家与民族产生扭曲的现代性心理:“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与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中国形象,划定了西方的中国想象的疆域,而两种两极化形象类型之间形成的张力,表现出西方文化扩张发展的特有的活力,这才是我们在现代化文化进程中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傲慢征服与谦逊求知,自我扩张与自我批判,西方走向世界的两种心态及其构成的充满活力的文化性格,是最有借鉴意义的。中国的现代化性格,在文化观念上向往与仰慕西方,在政治经济上却受西方扩张力量的压迫与侵略,对外的向往仰慕往往伴随着对内的自卑与轻贱心理而出现,文化心态与社会结构失衡,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政治经济上以封闭表现反抗,在文化上以自大表现仇外,在观念与现实之间,不但没有形成一种健康的内向与外向的张力关系,还造成文化精神的褊狭,或极端仰慕或极端仇视,或极端自卑或极端自大。这也是第三世界或整个东方的现代化历程中共同面临的问题。”^①

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角度看,所谓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文化霸权问题,只是这种形象开始其跨文化流动时,才开始展示出来。在《天朝遥远》所进行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的边界或尽头,出现的是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问题。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研究,不仅关注西方的中国形象问题,也关注其他国家的中国形象问题。否则,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本身,就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前提下进行的。跨文化形象学研究必然面对所谓的“世界的中国形象”问题。世界的中国形象课题探讨现代中国自我认同的多重维面与多重意义。现代中国的自我认同,是在与多向他者的意象性关联中完成的,从中可能获得不同的“身份”。如果说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那么,世界不同国家地区文化圈的中国形象,则是个多棱镜。在多棱镜中认同现代中国的自我身份,既是一种建构过程,也是一种解构过程。建构是发现现代中国自我的意义的丰富性,解构的功能则从意义的差异矛盾与比较批判中觉醒到镜像认同的虚幻性与异化过程。^②

跨文化形象学有必要开展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发掘中国形象在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意义维面与多元意义语境,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文化霸权。研究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结构以及其中展现的西方话语霸权,追索其症结所在,是

① 周宁:《另一种东方主义:超越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② 周宁:《世界之中国:域外中国形象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西方现代性在现代世界观念秩序中表现出的某种强大的“形塑力”。这种形塑力来源于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的两种相互关联的核心力量:一是自我认同,二是异己分化。其自我认同力不仅表现在西方文化内部趋向凝聚,还表现在西方文化面对非西方文化不断施展的向心性的吸引力;另一个方面,在强化自我认同的同时,也在进行异己分化,在西方现代性的全球化推进过程中,所到之处,前现代世界秩序的文化结构,纷纷出现难以弥合的断裂冲突,当今世界误解与冲突最深刻的地方,往往是前现代社会曾经构成某种文化共同体的区域。这一点明显表现在曾经共处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中国与日本,曾经共享佛教文化的中国与印度,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分享“东方性”的中国与俄罗斯,后者在进入现代性世界秩序后对中国表现出的强烈的否定态度,是最好的明证。

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与“异己分化”一体两用的精神核心,便成为跨文化形象学追问的真正问题。笔者选择日本、印度、俄罗斯的中国形象分析,只是论证这一精神核心的典型个案。日本、印度,或许还有俄罗斯,所有这些在现代性观念秩序中被“排斥”为“东方”国家的中国形象,最终只是“东方”的一种“自我东方化”叙事,不仅视野与立场是西方的,想象的主体也是西方的。表面上看,“东方”国家在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中获得现代性文化的自我确证,实际上同时将自我变成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值得思考的是,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体系中,非西方国家之间是否已经失去了思考对方的意愿与能力?难道只有西方在思考世界,而我们只思考西方并模仿西方思考?分析这些国家的中国形象,一个明显的问题,即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是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身的文化身份。

跨文化形象学提出四个在逻辑层面上不断深入的问题:一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中国形象各自的特征及其演变的历史,他们出于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与现实环境,形成不同的中国形象及其表述策略,其动机与形式都具有自身深远的文化根源;二是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中国形象越来越频繁便捷地进行“跨文化流动”,形成中国形象的世界观念体系,任何一个国家地区都无法“独自”地表述中国,其表述资源与策略都具有跨文化特征;三是中国形象的世界观念体系中存在着西方的文化霸权,往往是西方的中国形象为其设定问题,提供思想资源、想象方式与表述策略,西方的中国形象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世界的中国形象的表述,这一点不论在日本、印度还是俄罗斯,都表现得非常充分;四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中国形象,既意味着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同时也隐喻着他们与西方的关系,其中包含着一个特定的、纠缠不清的、危险的三角关系。

全球化进程中,不论现代俄罗斯、印度或日本,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这些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他们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所有非西方国家在确认自我、想象他者的时候,都不自觉并自愿地将自身置于现代西方的“他者”地位上,接受西方现代的世界观念秩序。日本、印度、俄罗斯,或者推广到东南亚、阿拉伯、拉美与非洲的中国形象,其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有西方中国形象的规训痕迹,成为这些国家地区在现代性自我认同结构中,“自我东方化”之下“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叙事的一部分。

《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作为书名的意义在于,中国形象研究是作为方法而不是目的出现的。在西方现代性主导下的世界观念体系中的中国形象问题,与一般国别中国形象研究的问题不同,个别国家或地区的中国形象是作为方法而不是目的出现的,表现在世界的中国形象网络或体系中的西方霸权,才是问题的关键。在逐渐全球化的西方现代性话语霸权中,不论日本或印度、俄罗斯,都难以在西方的东方主义或东方的西方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这样,以中国形象为方法的跨文化研究,就必然面对这一问题: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在现代性世界观念体系中如何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跨文化形象学尽管以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为专题,但却不是个别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而是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在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流动中构成的中国形象网络,以及该形象网络中的西方现代性的主宰力量或“文化霸权”。现代世界除西方文化外,还有伊斯兰文化、东亚儒家文化、南亚、东南亚、非洲与拉美不同地区的文化,这些国家或地区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在全球化现代性观念体系中可能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再生产形式。从西方的中国形象开始的跨文化形象学研究,最终可能又回归到西方。西方的中国形象,似乎既是起点又是终点。

二

跨文化形象学关注的就不仅是个别国家中国形象的特征与历史,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个别国家中国形象上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以及其中显示的西方的中国形象霸权”。这种霸权直指西方现代性主导的世界观念秩序,深藏在该世界观念秩序中的核心动力,就是西方现代性精神自我认同与异己分化的形塑力。这种危险的形塑力,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主宰着世界观念秩序,剥夺了非西方国家的话语权,使它们既彼此排斥,又排斥自身,失去思想的主体性,也失

去思想本身。跨文化形象学有关中国形象跨文化流动结构的研究,正指向这一根本问题。在西方现代性主导的世界观念秩序中,任何一个国家都只能在西方话语中表述自我与他者,它们在西方现代性话语中确认自身,塑造中国形象;反过来,现代中国也在西方现代性中确认自身,表述他者。跨文化形象学的进一步研究,将关注西方的中国形象影响或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问题直接指向中国现代性自我认同与文化自觉。

跨文化形象学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世界观念体系以及该体系中现代国家与国民自我认同的问题。对于那些“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不管是“进入”还是被强行“拖入”现代世界体系,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文化困境:就是如何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确认自身的国家身份,它是关系到“国家理想”。很少有哪个国家能够避免这个问题的困扰,更少国家能够从现代性世界观念体系中成功地拯救出自身的文化主体。中国亦不例外。不论“五四”时代的经典自由主义传统,还是后“五四”时代反现代西方的革命传统,实际上都难以摆脱西方现代性观念霸权。而这种霸权真正令人生畏的是,你无法不在西方现代性框架内思想中国,除非你放弃思想。因为思想的问题与方法,都是西方现代性范畴内的。

西方现代性主导的世界观念秩序中自我认同与异己分化的形塑力,不仅造成非西方国家彼此之间的想象分化,同时也造成这些国家自我想象与思想的分化。中国现代性思想的主体性危机就出现在这里。在众多“他者”最终归为同一“他者”,而同一“他者”又幻化出众多“他者”的奇异困惑的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现代中国思想是否可能确认自身?是否可能超越西方现代性观念而思想自身?如果用西方的“中国思想”思想中国,中国就可能在思想上被他者化,而不用西方的“中国思想”思想中国,中国是否还能够思想自身并承担起思想的主体性?我们的困境在于,背弃中国现代性思想主体的批判,即使可以看到中国过往的陷阱,也看不到中国未来的前景;而重建中国思想主体的理论,可以看清问题的来路,但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是在西方现代启蒙思想框架下进行的,人的主体性是思想的核心问题,在“五四”传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运动的大背景下,高扬人的主体性,追求个性解放与人的自由,其思想诉求具有明显的启蒙哲学色彩。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新启蒙”思想受挫引起的反思,以及全球化进程提出的问题,中国思想出现一次转型,问题与方法都变了,似乎“人”已不是问题,“中国人”才是问题;似乎启蒙思想已经过时,后现代方法才能为中国现代性自我找到出路并奠定基础。在“中国文化自觉”的时代命题下,中国思想必须摆脱西方启蒙现代性,恢复自身的思想能力,独立并创造性地思考中国的

历史命运以及现代化理想。^①于是,人的主体性置换为国家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是一个知识与道德哲学问题,而国家主体性则是一个政治哲学法哲学乃至意识形态问题。^②

跨文化形象学所关注的问题,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命题相关,只是研究的路径有所不同。笔者 20 世纪 90 年代中叶开始关注西方的中国形象问题。如何建构中国的思想主体?笔者认为,不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霸权,就无法拯救中国现代性思想。借助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解构西方现代性思想体系中的中国话语,就成为笔者所选择的方法路径。当然,分享那个时代的问题与方法,也就不可避免地落入那个时代思想的困境。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的转型,明显带有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色彩,国家主体取代人的主体,成为思想关注的对象。这次“重思中国”的思想转型,不仅否定新启蒙思潮的人的自由与个性解放等自由主义问题,也否定了新启蒙的西方思想路径,转型的方向,一是中国传统思想,一是西方左翼思想,而且这两种思想在反抗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上有暗合之处。

这次思想转型将思想的主体“人”置换为“中国”,有中国思想自身逻辑的问题,也有外在世界的现实问题。并入全球化进程的现代化中国,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胁迫,作为全球主义历史进程的反弹,中国思想开始以解构西方启蒙哲学为姿态与方法,试图从西方现代性主导的世界观念秩序中拯救中国思想。问题并没有错位,但思想路径却值得怀疑。“重思中国”思潮或者借助中国传统思想对抗西方思想传统,或者借助西方后现代哲学对抗西方自由主义传统,试图从西方思想霸权中拯救中国思想主体。但可疑的是,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路径是否可以拯救中国思想主体?

拯救中国思想主体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具有思想中国的主体意识,而在于是否具有主体思想的能力,不是有没有主体,而是有没有思想。近代以来,在各种文化思潮中,中国从未丧失过文化主体的自我意识。不管是师夷长

① 20 世纪 90 年代费孝通先生明确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认为文化自觉是时代的要求,“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使命完成了,当代知识分子的新课题是“文化自觉”。参见方李莉:《费孝通先生的“最后一重山”——费孝通晚年学术思想诠释与理解》,《中华读书报》,2010 年 12 月 8 日第 5 版。赵汀阳用“重思中国”说明这次思想转型,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② 邓正来从法学角度提出“主体性的中国”,关注进入世界结构的中国的政治文化合法性与话语权问题。吕勇在《当代中国思想界对主体性的两种讨论——以李泽厚“主体性的人”与邓正来“主体性的中国”为例》一文中(《江汉大学学报》2010 年第 1 期),讨论中国当代思想的这次转型。

技、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还是发扬国故、民族自新、中国模式,所有这些选择都是手段,唯一的目的是中国现代化。现代化是一种文明类型,而实现这种文明类型的主体是中国。所以,作为思想主体的中国是个伪问题。在现代中国,中国思想的主体意识从未失落过,问题在中国思想或中国思想的能力上。建构中国思想主体,只能从中国思想中建构,没有思想,谈何思想主体?

从思想中拯救主体,还是从主体中拯救思想? 考验中国思想的尺度,不在于中国思想是否具有主体意识,而在于中国是否有能力创造性思想。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新国学”与“新左派”叙述,试图从西方话语中解放中国主体,又何尝不受西方“汉学”与西方后现代“左翼”思想的影响? 如果说西方思想曾经陷害了我们的思想主体,那么拒绝西方思想的中国思想,是否能够担当起为自身重建主体的重任呢? 遗憾的是,中国思想似乎无法解放自身重塑主体,不是因为缺乏思想的主体意识与主体诉求,而是因为主体意识与诉求没有思想的支持。现代中国尚未建立健全的现代性思想体系,就目前的状态看,中国思想比“主体缺失”更严重的问题是“思想缺失”,中国现代性精神自我建构的最大危险,是中国主体目前正在陷害中国思想。

回归传统与走向左翼,有中国思想的姿态,却没有中国现代性思想的实质,它们可能宣誓现代性思想主体诉求,但无法提供现代性思想本身。进入现代化历史以来,中国传统思想结构在西方现代性冲击下解体,只留下没有思想唯有激情的主体意识,支持这种主体意识的唯一力量,就是盲目的民族主义。与此同时,西方现代性开始塑造中国思想,从问题到方法,现代中国模仿西方思想思考自身,既没有中国的问题,也没有中国的方法,甚至中国思想主体性这个问题本身,也是西方现代性观念秩序所设定的。没有西方现代性的普世诉求,何有对抗性的中国思想的主体意识? 有对抗性的中国思想的主体意识,却没有中国思想的本土资源与能力,连对抗西方现代性观念秩序的批判话语都是西方式的。于是,我们看到现代中国思想的两难困境,或者是没有思想的主体,或者是没有主体的思想。即使可能具有中国思想的主体诉求,却没有支持这种诉求的中国思想能力,过去 30 年中国现代性思想路径,就在这种两难中摇摆不定、挣脱不出。

或者是没有主体的思想,或者是没有思想的主体,这是中国现代性精神的困境。20 世纪 80 年代新启蒙思潮遭受挫败,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全球化文明冲击下,产生重建中国文化主体的理论诉求,新国学与新左派思潮从不同路径关注这一问题,但方向与方法都令人生疑,因为它们最终可能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中会合。在文化自觉的理论诉求下,西方“后学”作为方法进入中国学术,其解构力量似乎有利于动摇西方文化霸权,却无益于建构中国现代性思想主体。当种种“后学”的文化批判理论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一种“理所当然”的

流行方法,同时也成为跨文化形象学运用的“熟能生巧”的惯用方法时,我们就有必要反思其作为方法的“合理性”了。

三

笔者反思跨文化形象学的问题与方法,推而广之,也可以反思中国当下学术思想的一般性问题与方法。如何从现代性话语体系中拯救中国的思想主体?这是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首要问题,也是跨文化形象学从一个特定角度试图思考的重大问题。笔者从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在西方现代性自我确证与自我怀疑、自我合法化与自我批判的动态结构中,解析中国形象;在跨文化公共空间中,分析中国形象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经验的过程与方式,解构西方的中国叙事,从西方话语霸权中拯救中国思想的主体性。但解构西方的中国叙事,不等于重建中国思想主体。因为思想主体是由思想结构设定的,如果没有“思想”,又谈何思想“主体”?跨文化形象学在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的终点上发现,现代中国没有办法摆脱西方的中国叙事来讲述自身,所有的讲述几乎都成为复述。我们的自我批判是在西方启蒙思想框架内进行的,我们的自我嘉许也是在西方的后启蒙思想框架中进行的。

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目前流行的中国崛起与民族复兴话语,这种话语的模式来自西方的“西方没落论”与“中国崛起论”,当西方人开始讲述中国崛起的动人故事时,中国也开始复述,西方人不仅给了我们信心、话题还有讲述此话题的方法。我们注意到,近年来中国本土关于中国崛起的叙述,除了GDP颂扬与晚会热闹之外,并没有多少学理性论述,反而是像《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①这类西方学者的著作,才真正试图在学理上分析中国崛起的意义,而这类分析,又总带有西方意见或西方偏见。为什么总在中西方二元对立框架内讨论中国崛起?为什么中国崛起一定对应着西方衰落?为什么思考世界的方式一定是二元对立框架内的?为什么世界不可能是多元的?为什么多元的世界不可能互动互惠、共存共荣,一定是此起彼伏、我兴你衰的呢?

反思跨文化研究的方法,首当其冲的是福柯的话语理论主导下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首先,任何一种方法都不能剥离其理论语境,否则其意义可能变异甚至完全相反,所谓“橘逾淮而北为枳”。后殖民主义是产生自西方思想体系

^① [意]阿里吉著,路爱国等译:《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英]马丁·雅克著,张莉等译:《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